

東方

文化集成

季羨林 主编

南亚文化编



印度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

——从拉吉夫·甘地执政到曼莫汉·辛格政府的建立

林承节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东方文化集成

南亚文化编

印度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

——从拉吉夫·甘地执政到曼莫汉·辛格政府的建

林承节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度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林承节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7
(东方文化集成)

ISBN 978-7-301-20893-9

I. ①印… II. ①林… III. ①印度—现代史—研究 IV. ①K35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9879 号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书 名: 印度近二十年的发展历程

——从拉吉夫·甘地执政到曼莫汉·辛格政府的建立

著作责任者: 林承节 著

组稿编辑: 张 冰

责任编辑: 肖凤超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0893-9/K·0873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xfc203@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9634

出版部 62751962

印刷者: 三河市欣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 毫米×980 毫米 A5 13.875 印张 428 千字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9.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东方文化集成】

《东方文化集成》为季羨林教授所倡导，由北京大学东方学研究院《东方文化集成》编委会组织撰写出版。

这是一项迎接 21 世纪东方文化复兴和再创辉煌的世界性文化工程。

《东方文化集成》编辑委员会

总主编 季羨林

名誉总顾问 谢慧如 泰国泰华文化教育基金会主席
北京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名誉所长

名誉顾问

纳吉布·迈哈福兹 埃及著名作家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柳存仁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教授

杜德桥 英国牛津大学汉语研究所所长 教授

韩素音 英籍著名华人女作家

冉云华 加拿大麦克马思特大学 教授

谢和耐 法国法兰西学院 院士 法国著名汉学家 教授

马汉茂 德国波鸿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 教授

饶宗颐 香港中文大学 教授

郑子瑜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高级研究员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夏希迪 伊朗德黑兰大学 教授 伊朗德胡达大百科全书编纂委员会主席

谭中 印度尼赫鲁大学原汉语系主任 教授

池田大作 日本创价学会名誉会长 北京大学名誉教授

平山郁夫 日本东京艺术大学校长 教授 日中友好协会会长

中村元 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 日本比较思想学会名誉会长

梁披云 澳门归侨总会会长 福州华侨大学董事长

捷达连科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 教授

王赓武 新加坡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所长 教授 前香港大学校长

金俊焯 韩国社会科学院院长

吴亨根 韩国东国大学佛学研究院院长

马悦然 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 教授 诺贝尔奖瑞典文学院评审委员会委员

杜维明 美国哈佛大学 教授 哈佛燕京学社主任

顾问(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元化	马 曜(白族)	任继愈	汤一介
纳 忠(回族)	林 志 纯	张广达	张岂之
侯仁之	清格尔泰(蒙族)	袁行霈	麻子英
林健忠	魏 维 贤(新加坡)		

《东方文化集成》总编委会

主 编 季羨林

副主编 陈嘉厚 叶奕良 张殿英 王邦维

张玉安 唐孟生

《东方文化集成》分编委会

《东方文化综合研究编》

主编 孟昭毅 郁龙余 编委 张光璘 黎跃进

《中华文化编》

主编 吴同瑞 刘烜 编委 王邦维 张帆

《日本文化编》

主编 严绍溥 副主编 李强 编委 潘金生 卞崇道 王新生

《朝鲜、韩国、蒙古文化编》

主编 陶炳蔚 编委 金柄珉 金景一 陈岗龙

《东南亚文化编》

主编 梁立基 副主编 裴晓睿 编委 梁英明 梁志明 李谋

《南亚文化编》

主编 黄宝生 副主编 薛克翘

编委 王 镛 刘曙雄 葛维钧 姜景奎

《伊朗、阿富汗文化编》

主编 叶奕良 编委 张鸿年 张敏 王一丹

《西亚、北非文化编》

主编 赵国忠 编委 孙承熙 仲跻昆 葛铁鹰 吴冰冰

《中亚文化编》

主编 赵常庆 编委 余太山 王小甫

《古代东方文化编》

主编 拱玉书 编委 李政

《东方文化集成》编辑部

主任 张殿英 副主任 卢蔚秋 张玉安

编辑 李 强 姚秉彦 唐孟生 樊津芳

编委会声明

为铭记季羨林等多位已故前辈对《东方文化集成》的历史贡献,为表达对他们的怀念,编委会特决定,在编委和顾问名单中保留他们的名字,不作变动。

《东方文化集成》总序

季 美 林

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世纪末”中。所谓“世纪”和“世纪末”，本来是人为地创造出来的。非若大自然中的春、夏、秋、冬，秩序井然，不可更易，而且每岁皆然，决不失信。“世纪”则不同，没有耶稣，何来“世纪”？没有“世纪”，何来“世纪末”？道理极明白易懂。然而一旦创造了出来，它就产生了影响，就有了威力。上一个“世纪末”，19世纪的“世纪末”，在西方文学艺术等意识形态领域中就出现过许多怪异现象，甚至有了“世纪末病”这样的名词，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无待辩论与争论。

当前这一个“世纪末”怎样呢？

我看也不例外。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了政治方面天翻地覆的变化，不能不令人感到吃惊。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也不平静。文化或文明的辩论或争论就很突出。平常时候，人们非不关心文化问题，只是时机似乎没到，争论不算激烈。而今一到世纪之末，人们非常敏感起来，似乎是憬然醒悟，于是东西各国的文人学士讨论文化的兴趣突然浓烈起来，写的文章和开的会议突然多了起来。许多不同的意见，如悬河泄水，滔滔不绝，五光十色，纷然杂陈。这样就形成了所谓“文化热”。

在这一股难以抗御的“文化热”中，我以孤陋寡闻的“野狐”之身，虽无意随喜，却实已被卷入其中。我是一个有话不说辄如骨鲠在喉的人，在许多会议上，在许多文章中，大放厥词，多次谈到我对文化，特别是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联系，以及东方文化在未来的新世纪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占的地位等等的看法。颇引起了一些不同的反响。

为说明问题计，现无妨把我个人对文化和与文化有关的一些问题的看法简要加以阐述。我认为，在过去若干千年的人类历史上，民族和国家，不论大小久暂，几乎都在广义的文化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贡献大小不同，性质不同，内容不同，影响不同，深浅不同，长短不同；但其为贡献则一也。人类的文化宝库是众多的民族或国家共同建造成的。使用一个文绉绉的术语，就是“文化多元主义”。主张世界

上只有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是法西斯分子的话，为我们所不能取。

文化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文化一旦产生，立即向外扩散，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文化交流”。文化决不独占山头，进行割据，从而称王称霸，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世袭珍藏，把自己孤立起来。文化是“天下为公”的。不管肤色，不择远近，传播扩散。人类到了今天，之所以能随时进步，对大自然，对社会，对自己内心认识得越来越深入细致，为自己谋的福利越来越大，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文化交流。

文化虽然千差万殊，各有各的特点；但却又能形成体系。特点相同、相似或相近的文化，组成了一个体系。据我个人的分法，纷纭复杂的文化，根据其共同之点，共可分为四个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欧美的文化体系。再扩而大之，全人类文化又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人类并没有创造出第三个大文化体系。

东西两大文化体系有其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既然同为文化，当然有其共同点，兹不具论。其不同之处则亦颇显著。其最基本的差异的根源，我认为就在于思维方式之不同。东方主综合，西方主分析，倘若仔细推究，这种差异在在有所表现，不论是在人文社会科学中，还是在理工学科中。我这个观点曾招致不少的争论。赞成者有之，否定者有之，想同我商榷者有之，持保留意见者亦有之。我总觉得，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对东西方文化了解研究得都还不够深透，有的人连我的想法了解得也还不够全面，不够实事求是，却唯争论是尚，所以我一概置之不答。

有人也许认为，我和我们这种对文化和东西文化差异的看法，是当代或近代的产物。我自己过去就有过这种看法。实则不然。法国伊朗学者阿里·玛扎海里所著《丝绸之路》这一部巨著中有许多关于中国古代发明创造的论述，大多数为我们所不知。我在这里不详细介绍。我只引几段古代波斯人和阿拉伯人论述中国文化和希腊文化的话：

由扎希兹转载的一种萨珊王朝（226—Ca. 640年）的说法是：“希腊人除了理论之外从未创造过任何东西。他们未传授过任何艺术。中国人则相反。他们确实传授了所有的工艺，但他们确实没有任何科学理论。”（329页）

姜林按：最后一句话不符合事实，中国也是有理论的。这就等于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哲学。完全是隔膜的外行话。书中还说：

在萨珊王朝之后，费尔多西、赛利比和比鲁尼等人都把丝绸织物、钢、砂浆、泥浆的发现一股脑儿地归于耶摩和耶摩赛德。但我们对于丝绸织物和钢刀的中国起源论坚信不疑。对于诸如泥浆——水泥等其余问题，它们有 99% 的可能性也是起源于中国。我们这样一来就可以理解安息——萨珊——阿拉伯——土库曼语中一句话的重大意义：“希腊人只有一只眼睛，唯有中国人才有两只眼睛。”约萨法·巴尔巴罗于 1471 年和 1474 年在波斯就曾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他同时还听说过这样一句学问深奥的表达形式：“希腊人仅懂得理论，唯有中国人才拥有技术。”(376 页)

关于一只眼睛和两只眼睛的说法，我还要补充一点：其他人同样也介绍了另外一种说法，它无疑是起源于摩尼教：

“除了以他们的两只眼睛观察一切的中国人和仅以一只眼睛观察的希腊人之外，其他的所有民族都是瞎子。”(329 页)

我之所以这样不厌其烦地引这许多话，绝不是因为外国人夸中国人有两只眼睛而沾沾自喜，睥睨一切。令我感兴趣的是，在这样漫长的时间以前，在波斯和阿拉伯地区就有了这样的说法。我们今天不能不佩服他们观察的细致与深刻，一下子就说到点子上。除了说中国没有理论我不能同意之外，别的意见我是完全同意的。在当时的世界上，确实只是中国和希腊有显著、突出、辉煌的文化。现在中国那一小撮言必称希腊的学者们或什么“者们”，可以憬然醒悟了。

但是这也还不是令我最感兴趣的问题。我最浓烈的兴奋点在于，正如我在上面所说的那样，畅谈东西文化之分，极富于近现代的摩登色彩。波斯和阿拉伯传说都证明：东西文化之分的说法，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而已。其次，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文化的东西二分法，我并非始作俑者，古代的“老外”已先我言之矣。令我更感到欣慰的是我讲的东西方思维方式是东西文化的基础。波斯和阿拉伯古代的说法，我认为完全证实了我的看法。分析出理论，综合出技术，难道不是这样子吗？

时至今日，古希腊连那一只眼睛也早已闭上，欧洲国家继承并发扬了古希腊辉煌的文化，使欧洲文化光照寰宇。工业革命以后，技术

也跟了上来，普天之下，莫非欧风。欧美人昏昏然陶醉于自己的胜利之中，以“天之骄子”自命，好像有了两三只眼睛。但他们完全忘记了历史，忽视了当前的危机。而中国呢，则在长时期内，由于内因和外因的缘故，似乎把两只眼睛都已闭上。古代灿烂文化不绝如缕。初则骄横自大，如清初诸帝那样，继则震于西方的船坚炮利，同样昏昏然拜倒在西方的什么裙下，一直到了今天，微有苏醒之意，正在奋发图强中。

从上面谈到的历史事实中，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东西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本来是两句老生常谈，是老百姓的话，并不是我的发明创造。我提出来说明东西文化的关系，国内外都有赞成者，国内外也有反对者，甚至激烈反对者。我窃以为这两句话只说明了一个事实。中国古代哲学讲变易，佛家讲无常，连辩证法也讲事物时时都在变化中。大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内心，无不证明这两句话的正确。我不过捡来利用而已。《三国演义》开宗明义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说的不也就是这个浅显的道理吗？

可是东西方都有人昧于这个浅显的道理。特别是在西方，颇有人在有意识或无意识中，觉得自己的辉煌文化会万岁千秋地辉煌下去的。中国追随者也大有人在。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文化也像世间的万事万物一样，不会永驻的，也是有一个诞生、发展、成长、衰竭、消逝的过程的。

但是，中国有一句俗语：是非自在人心。人是能够辨是非，明事理的。以自己的文化自傲的西方人也不例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这种人简直如凤毛麟角。一战爆发，惊醒了某一些有识之士。事实上在一战爆发前，就有人有了预感。德国学者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在1911年就预感到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后来大战果然爆发。从1917年起，斯宾格勒就开始写《西方的没落》。书一出版，立即洛阳纸贵。他的基本想法是：文化都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青春，二、生长，三、成熟，四、衰败。尽管他的推论方法，收集资料，还难免有主观唯心的色彩。但是，他毕竟有这一份勇气，有这一份睿智，敢预言当时如日中天的，他认为在世界历史上八个文化中唯一还有活力的文化也会“没落”。我们不能不对他表示敬意。美中不足的是，他还没有认识到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存在和交流关系。（参阅齐世荣等译《西方的没落》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95年）

在西方，继斯宾格爾而起的是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 1889—1975年）。他自称是受到了前者的影响。二人同样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是他们有先见卓识之处。汤因比继承了斯宾格爾的意见，认为文化——他称之为“文明”——都有生长一直到灭亡的过程。他把人类历史上的文明分为21种，有时又分为26种。这些意见都表述在他的巨著《历史研究》中（1934—1961年），共12卷。他比斯宾格爾高明之处，是引入东方文化的讨论。到了70年代，他同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对话时，更进一步加以发挥，寄希望于东方文化。（参阅《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

我并不认为，斯宾格爾和汤因比——继他们之后欧美一些国家还有一批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赞成他们的意见，我在这里不具引——等的看法都百分之百正确。但在举世昏昏，特别是欧美人昏昏的情况下，唯独他们闪耀出一点灵光，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们的看法从大体上来看，我认为是正确的。如果借用上面提到的古代波斯和阿拉伯人的说法，我就想说：希腊人及其后代的那一只眼睛，后来逐渐变成了两只眼睛；可物极必反，现在快要闭上了。中国人的两只眼睛，闭上了一阵，现在又要睁开了。

闭上眼睛的欧美人士，绝大多数一点也不了解东方，而且压根儿也没有了解的愿望。我最近多次听人说到，西方至今还有人认为中国人还缠小脚，拖辫子，抽大烟，养小老婆。甚至连文人学士还有不知道鲁迅为何许人者。在这样地球越变越小，信息爆炸的时代，西方之“文明人”竟还如此昏聩，真不能不令人大为惊异。反观我们中国，情况恰恰相反。欧美的一切，我们几乎都加以崇拜。汉堡包、肯德基、比萨饼，甚至莫须有的加州牛肉面，只要加一个洋字，立即产生大魅力，群众趋之若鹜。连起名字，有的都带有点洋味。个人名字与店铺名字，莫不皆然。至于化妆品，外国进口的本来就多。中国自造的也多冠以洋名，以广招徕。爱国之士，无不痛心疾首，谴责这种崇洋媚外的风气和行为。然而，从一分为二的观点上来看，也有其有利的一面。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专就东西而论，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对西方几乎是了若指掌，而西方对东方则如上面所说的那样，是一团漆黑。将来一旦有事，哪一方面占有利条件和地位，昭如日月矣。

对西方的文化，鲁迅先生曾主张“拿来主义”。这个主义至今也没

有过时。过去我们拿来，今天我们仍然拿来，只要拿得不过头，不把西方文化的糟粕和垃圾一并拿来，就是好事，就会对我们国家的建设有利。但是，根据我上面讲的情况，我觉得，今天，在拿来主义的同时，我们应该提倡“送去主义”，而且应该定为重点。为了全体人类的福利，为了全体人类的未来，我们有义务要送去的，但我们决不会把糟粕和垃圾送给西方。不管他们接受，还是不接受，我们总是要送的。《诗经·大雅》说：“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西方文化给人类带来了一些好处。我们中国人，我们东方人，是懂得感恩图报的民族。我们决不会白吃白拿。

那么，报些什么东西呢？送去些什么东西呢？送去的一定是我们东方文化中的精华。送去要有针对性，针对的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那一个西方文化产生的“危机”。光说“危机”，过于抽象。具体地说，应该说是“弊端”。近几百年以来，西方文化产生的弊端颇多，举其大者，如环境污染、大气污染、臭氧层破坏、生态平衡破坏、物种灭绝、人口爆炸、新疾病丛生、淡水资源匮乏等等。此等弊端，如不纠正，则人类前途岌岌可危。弊端产生的根源，与西方文化的分析的思维方式有紧密联系。西方对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的大自然分析不息，穷追不息，提出了“征服自然”的口号。“天何言哉！”然而“天”——大自然却是能惩罚的，惩罚的结果就产生了上述诸种弊端。

拯救之方，我认为有的，这就是“改弦更张”、“改恶向善”，而这一点只有东方文化能做到。东方文化的基本思维方式是综合，表现在哲学上就是“天人合一”，张载的《西铭》是一篇表现“天人合一”思想最精辟的文章：“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下略）印度哲学中的“梵我一如”，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总之，东方文化主张人与大自然是朋友，不是敌人，不能讲什么“征服”。只有在了解大自然，热爱大自然的条件下，才能伸手向大自然索取人类衣、食、住、行所需要的一切。也只有这样，人类的前途才有保障。

我们要送给西方的就是这种我们文化中的精华。这就是我们“送去主义”的重要内容。

我们的“李”送了出去，接受不接受呢？实际上，我们还没有正式地送，大规模地送。连我们东方人自己，其中当然包括中国人，还不

知道，还不承认自己的这种宝贝，我们盲目追随西方，也同样向自然界开过战，我们也同样有那一些弊端，立即要求西方接受，不也太过分了吗？不过，倘若稍稍留意，人们就会发现，现在世界各国，不管出于什么动机，也不管是根据什么哲学，注意到上述弊端而又力求改变的人越来越多了。今年《日本经济新闻》刊载了高木韧生的文章，说21世纪科研重点将是“人类生存战略”。这的确是见道之言。我体会，这里所说的“科研”包括文理两个方面。作者把科研提高到“人类生存”这个高度来看，不能不谓之有先见之明，应该受到我们大家的最高的赞扬。至于惊呼人口爆炸的文章，慨叹新疾病产生的议论，让人警惕环境污染、臭氧层破坏、生态平衡的破坏、淡水资源的匮乏等等的号召，几乎天天可见。人类变得聪明起来了，人类前途不是漆黑一片了。我想，世界各国每一个有心人，无不为之欢欣鼓舞。我这一个望九之年的耄耋老人，也为之手舞足蹈了。

我在上面刺刺不休说了那么多话，画龙点睛，不出一点：我曾在这次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说过一篇短话，题目叫做“只有东方文化能够拯救人类”。我在上面说的千言万语，其核心就是这一句短短的话。至于已经来到我们门前的21世纪究竟是什么样子？西方文化究竟如何演变？东方文化究竟能起什么具体的不是空洞的作用？人类的前途究竟何去何从？所有这一切问题，都有待于历史发展的进程来加以证明。从前我读过一个近视眼猜匾的笑话。现在新的一个世纪还没有来临，匾还没有挂出来，上面有什么字，我们还不能知道。不管自诩眼睛多么好，看得多么远，在这一块尚未挂出来的匾前，我们都是近视眼。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学习，就是了解。我们责怪西方不了解东方文化，不了解东方，不了解中国，难道我们自己就了解吗？如果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就应该坦率地承认，我们中国人自己也并不全了解中国，并不全了解东方，并不全了解东方文化。实在说，这是一出无声的悲剧。

了解的唯一途径就是学习，而学习首先必须有资料。对我们知识分子来说，学习资料首先是文字，也就是书籍。环顾当今世界，在“欧洲中心论”还有市场的情况下，在西方某一些人还昏昏然没有睁开眼睛的时候，有关东方的书籍，极少极少。有之，亦多有偏见，不能客观。西方如此，东方也不例外。即使我们有学习的愿望，也是欲学无书。

当然，东方各国的情况不尽相同，各国刊出书籍的多寡也不尽相同。但总之是很少的。有的小一点的国家，简直形同空白。有个别东方国家几乎毫无人知，它们的存在在一团迷雾中，若明若暗，似有似无。这也是一出无声的悲剧。

就是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这一批人不自量力——或者更明确地说是认真“量”过了自己的“力”，倡议编纂这一套巨大空前的《东方文化集成》。虽然，我们目前的队伍，由于历史造成的原因，还不是太大；我们的基础还不是太雄厚；但是，我们相信主观能动性。我们想“挽狂澜于既倒”，我们决非徒托空言。世界人民、东方人民、中国人民的需要，是我们的动力。东方人民和西方人民的相互了解，是我们的愿望。东方人民和西方人民越来越变得聪明，是我们的追求。我们老、中、青三结合，而对著作的要求则是高水平的。我们希望，能通过这个活动，既提高了中国对东方文化的研究水平，又能培养出一批学有专长的人才，收得一举两得之效。

我们既反对“欧洲中心主义”，我们反对民族歧视。但我们也并不张扬“东方中心主义”。如果说到或者想到，在21世纪东方文化将首领风骚的话，那也是出于我们对历史发展的观察与预见，并不出于什么“主义”。本着这种精神，我们对东方几十个国家一视同仁。国家不论大小，人口不论多寡，历史不论久暂，地位不论轻重，我们都平等对待，决不抬高与贬低，拜倒与歧视。每一个东方国家都在我们丛书占有地位。但国家毕竟不同，资料毕竟多寡悬殊。我们也无法强求统一。有的国家占的篇幅多一点，有的少一点。这是实事求是，与歧视毫无关联。我们虔诚希望，在即将来临的21世纪中，中国的两只眼睛都能睁开，而且睁得大大的，明亮而睿智。西方的一只眼睛能变成两只，也同样睁开，而且睁得大大的，明亮而且睿智。世界上各个民族也都有了两只眼睛，都要睁得大大的，明亮而且睿智。我们共同学习，努力互相了解。我们坚决相信，只要能做到这一步，人类会越来越能相互了解，世界和平越来越成为可能，人类的日子会越来越好过，不管还需要多么长的时间，人类有朝一日总会共同进入太平盛世，共同进入大同之域。

前 言

本书是拙作《印度独立后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史》(昆仑出版社出版,2002年)的续篇,那部书从印度独立写到1984年英迪拉·甘地总理遇害,拉吉夫·甘地继任总理;本书则从拉吉夫·甘地执政,写到2004年5月大选,瓦杰帕伊政府下台,以曼莫汉·辛格为总理的团结进步联盟政府建立为止。

印度独立后的历史,大致说可以分为两大时期。第一时期是从1947年8月15日印度独立,到英·甘地第二次担任总理时期;第二时期是从拉吉夫·甘地继任总理起,一直到今天仍在继续。第一时期的中心任务是为获得新生的国家确定发展目标,规划基本道路,制定发展战略和内外政策并开始实施。这一时期除两三年外都是由印度国大党执政。它领导全国人民,团结各种政治力量,较为出色地完成了上述历史任务,其中开国总理尼赫鲁的贡献尤为突出。在国大党领导下,印度成了一个依靠自力更生成长的,把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并列为国家发展目标的新兴发展中大国;在对外政策上奉行独立自主的方针,成了世界不结盟运动的核心成员国之一,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良好形象。这些成果为印度此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尼赫鲁规划的道路在经济战略上也有不完善之处。首先,经济发展模式的定位在基本正确的情况下有一定的偏颇,如赋予国营成分以过多的政治经济期望值,对私营成分管制过严过死,对自力更生理解片面,对农业合作化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等。这些缺陷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越来越突出地暴露出来。尼赫鲁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对他不应苛求,任何英明领袖的任何规划也不能十全十美。它要求后来的政府领导人善于因应形势,及时做出调整,改变已经过时的或本来就有缺陷的政策,随着时代前进。继任的总理夏斯特里和英迪拉·甘地在有些方面做了勇敢的和及时的改变,如实行绿色革命,改变农业发展战略等。然而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表明,他们以及后来人民党政府的领导人对变化了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及发展趋向都缺乏整体的认识,更谈不上具有前瞻性。因而对印度经济政策应该向哪个方向

调整以及怎样调整心中都没有底。英·甘地由于政治因素的支配，在她执政时甚至和当时的需要背道而驰，实行更为偏激的政策，延误了必要的调整，致使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

印度根据自己的国情在国家体制方面实行联邦制。在联邦制下中央和邦在立法和行政上有明确的分权规定。可是，受独立初期国大党事实上垄断中央和邦两级政权的影响，尼赫鲁在处理中央和邦的关系方面，有过分考虑加强中央权力，损害邦级权力的趋向，对来自邦政权的抱怨和不满，都拿到国大党内，用要求地方组织服从中央决定的方式处理。英·甘地执政后不但没有纠正这种偏差，反而变本加厉侵害邦级权力，如扭曲邦长职权，滥用总统治理权力，扶植代理人对非国大党的邦政权策划颠覆活动等。在她执政时期，中央和地方关系极为紧张，不止一个邦发生武装动乱，而她本人最终也成了动乱的牺牲品。

1984年10月31日拉·甘地继任总理时形势是严峻的。在经济方面，印度的发展即便在亚洲，和先进国家与地区比，也已经严重落后；在政治方面，社会的安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运作都处在动荡和解体的威胁中。印度面临的种种政策调整和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下去了。可喜的是，临危受命的拉·甘地决心用新的思维和改革来刷新印度，摈弃已经过时的机制和政策，建立一个能随时代潮流前进的新印度。这样，印度独立后发展史的第二时期即震荡和沸腾改革时期就在乍暖还寒的氛围中揭开了帷幕。

第二时期的历史任务是在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政治体制运作、中央—地方关系和社会的整合等领域，根据形势的变化和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整、改革，制定新的政策，建立更有效的机制。同时，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发掘各种潜力，实现经济快速增长和现代化，在此基础上，推进教育和文化事业，改善社会福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国家的经济实力、科研水平和军事实力都要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增强。最终的目标是实现独立运动领袖们的伟大理想——使印度成为一个“有声有色的”世界大国。

改革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特别是经济领域的改革。困难在于，原来的模式是一种倾向于限制上层，较多照顾下层群众利益的平衡。而改变这种模式，确立增长取向的新模式，意味着要打破原来的平衡，建立新的平衡，而这种新平衡是更有利于中上层的。这种改变牵动着亿万下层群众的利益和感情。尽管新的模式从长远说也有利于下层群众，但下层群众渴望较快地看到实惠，在不能满足时，他们中不少人对改革由期盼转变成失望。左翼政党和其他反对党提出种种指责，甚至